

导 论

日复一日 案复一案 [最高法院] 忙于设计一部我所不承认的国家的宪法。

——最高法院法官安提宁·斯加拉
罗默诉伊文思案

至少直到最近，美国人都有理由对政府漠不关心。我们知道，政府不能使我们变得富裕或聪明（更不用说善了），并且我们很希望政府不使我们陷入贫困和堕落。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人民使他们自己变得贫困或繁荣，使他们自己变得自由或受奴役。此外，直到最近，美国人认为，我们在很久之前曾经断然对成为何种人民作出了选择，并且我们并不怀疑，由于我们全力对付目前的问题，所以我们长期地在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们曾经断定，未来带给我们的只是更多的财富、自由和幸福，而我们现在认识到，一系列的可能性要广泛得多。

任何 40 岁以上的人都很有兴趣地认为，我们居住的美国乃是一个与我们曾在那里成长的美国不同的国家。我们使我们的生活各方面发生变化：我们如何抚养孩子，我们期望于未来的什么东西会使物质和技术的变化相形见绌。当我们问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时，我们通常都会兴奋地谈到政府。

我们然后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政府所做或不做的事情如何才能使我们理想中的或我们梦魇中的生活有所区别。由于我们可以同意，我们的性格形成我们生活的极大差异，所以我们认识到，政府影响公民的性格，正如公民的性格形成政府一样。无论我们打哪儿开始，我们都被迫去处理我们如何管理我们自己和我们如何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试看纽约市的生活。1994 年 7 月，长时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市政府决定，对一丝不挂地乘地铁的人可予以拘捕，但只能是因为这个人在抽烟。早先一代的该市官员会毫不犹豫地保护社区反对“下流的曝光”但到 1994 年，已很难找得到一个能说明这一概念的官员了。不过官员之间广泛地同意，乘坐地铁的人应受保护而不受二手烟的侵害，这是这些官员的父母一辈子闻所未闻的。从不能容忍在公众场合赤身裸体到不能容忍在公共场合抽烟的变化，确实是美国公共生活革命的一个缩影。

或者考虑这样一个场景：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之前，在暮春任何一个星期五的夜晚，纽约街道到处都是游荡着的身穿小夜礼服和长袍的成双结对的舞伴。一对对的舞伴会把酒吧关了，把面包店打开，注视着太阳从斯泰登岛的渡口或纽约市各座大桥升起。很少有人会担心他们的安全和失去自制。而今天，啤酒店为 18 岁的人服务是一种犯罪，在美国城市的街上游荡到天亮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被怀疑具有自杀的本能。

或者考虑到这样一个现象：十分偶然地，一对十几岁的情侣中的少女怀了孕，典型的做法是接着来一次突击结婚。这给所有人的教训是，正像那时候人们所唱的，“恋爱和结婚走到一起，就像是一匹马和一驾车”。而今天，马和性之车（甬提爱了）同婚姻，越来越无关了。三分之二的黑人孩子和五分之一的白人孩

子都是非婚生的。¹ 如果导致怀孕的男青年是下等社会的，如果盯得很牢，那么他还可以分享女孩的福利费。如果他是上层社会的，正常的做法是迫使女孩堕胎，把婴儿看作是对更重要事情的干扰。“突击结婚”这个词现在成了难以理解的了，对作为基础的婚姻责任的强制，通常是被人憎恨的。习俗的这一革命在公共生活中是很明显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 纳尔逊·洛克菲勒之所以未能取得总统候选人的初步基础，就是因为他的离婚动摇了公众的道德，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同居已是十分普遍，比较起来，离婚与再婚已显然是保守了。因此，没有人认为，罗纳德·里根的离婚和再婚使他没有资格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领袖（更不消说担任总统职位了）。又再，一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前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可以当得上索福克里斯在《安提戈涅》中克里昂所说的话：“他作为他家正当的主人 将会是一个公正的政治家”。² 对以后的毕业生来说，这种感情正像舶来品一样的陌生。

或者考虑到这样一点：在 1965 年，国会议员的五分之四是退伍军人，而且一项模范的服役记录对一个男人在社会中发展是不可缺少的。³ 而在 1992 年，全国选出了一个公开蔑视服兵役的总统，而任何试图在商界、媒体或学术界取得成就的年轻人却发现，如果服兵役没有完全取消他的资格，那也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带有令人不快的下层阶级味道的社会陌生人。

我们将不再描述我们之间一种使规则松弛的变化。不，规则仍像以前一样的严密，并且也许更严密，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的严密。但它们是不同的。今天，人们是否能够想象一座美国电视台播出一个关于后悔的同性恋者的戏剧，这个同性恋者向一个牧师忏悔他的有罪的生活方式？更不可理解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的电视中竟讨论起共产主义的罪

恶。现代美国正同极遥远的新几内亚一样有自己的禁忌。但这些禁忌一直在变化。有些是全新的，而另一些则完全倒退到旧的。在美国，一个单纯的种族玩笑，或者甚至是能作种族解释的一句话，都可以使人付出一生事业的代价。因此，霍华德·柯赛尔的运动广播 30 年结束于一次星期一晚上足球比赛的时候，华盛顿雷得斯金斯队的阿尔文·迦列特突然说了一句：“看那个小猢猻走了！”还有，尽管没有哪项法律禁止传统的英语用阳性代词涵盖两性，也没有任何法律废除 Miss（小姐）和 Mrs（先生）这两个词，但编辑却不断要求作者使用中性语言以及 Ms（女士）这个名称。

今天，不像一代人以前，任何地方，人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一面美国国旗。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公立学校里自由地公开地进行祈祷。学生已经暂停唱圣诞颂歌。⁴警察在今天必须提醒犯罪嫌疑人拥有诉讼权利，但不像以前的年代，警察和其他政府机构可以当场扣押财产而不必经提起刑事诉讼。与以前相比，更多的官员有权要个人服从繁重的诉讼程序。马萨诸塞州一个放泄了一小股水的消防队长，由于没有获得准许，破坏了水坝而被罚得倾家荡产；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家庭主人被罚了 1 万美元，因为他杀了一只到他花园里偷吃果实的松鼠；一个 80 岁的纽约老妇由于一名警察不喜欢她的态度而受到“控诉”，其中包括一次搜身。在现代美国，任何人要使他或她的生活受破坏所需做的一切，就是成为某个官僚所热衷的计划部分或适应于某个机构的“形象”。例如，被指控对孩子实施性虐待的人，根据专家们从走路都摇摇摆摆的人那里“发现”的证据，现在可能坐牢；一个亲属的鉴定就使得过去曾是负责任的父母亲表现的打倔强孩子的屁股变成为虐待儿童，而这是政府要求予以匿名追诉的。首先，不征得政府准许，人们今天可以做的事情比以前少

了。所以，美国不但使“异常的举止下来”（用参议员丹尼尔·P.莫伊尼汉的话来说）而且使其他种类的行为“上去”（从缺乏到正常），还有增加全新的事物范畴，这些事物是值得赞扬的或为社会所不容的。简言之，不必把我们的美国简单地描述为“一切都行”的地方。

毋须延长那些对比的系列，以弄清楚今天的生活与我们一代人以前美国人生活的差异，超过了一代人以前美国人与我们当代西欧人生活的差异。简言之，我们已经充分地改变了国家。我们中的有些人爱新国家赛过旧国家。但这并不是关键。由于我们正在继续变化，从现在开始的一代中，我们是否很可能生活在已经是另一种国家里？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必须问：我们可能成为怎样的人？我们想要成为哪种人民？另一个问题（比较直接地切中要害）产生了：我们的政治选择，即关于我们变成繁荣和文明的才能，关于我们保卫我们自己的才能，以及关于我们的家庭生活和精神，会有哪些长期的后果？

本书讲述的是，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政府系统，即政治制度怎样影响到在其统治下的人们的经济、市民、家庭、精神和军事习惯。本书并不打算提供任何既定的国家，更不消说美国的任何既定的一系列习惯所产生的“完整图画”。完整的图画包括社会不同部分对抗政治制度的各种形式、各种斗争，以及对抗和斗争的结果。但本书比较简单的任务是描述各种政治制度在做什么。它的前提是，政府和社会的主要成员（这些合在一起组成叫做“既成权力机构”或“政治制度”的东西）对维护生活方式、拆毁它们或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是有大量事情要去做。

选择——激进的和非激进的

19 世纪 30 年代，亚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描述了美国。

那时候 约翰·马歇尔是首席大法官，安德鲁·杰克逊是总统，丹尼尔·韦勃斯特在参议院里，留下了由美国自己的规则类型所促进的一种生活的生动记录。建立在当时不言自明的主张上的那种生活（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和一个非常受到限制的政府）离开我们是遥远得足以提供，如果不是一系列对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政治组织和经济及社会政策的现实主义选择的话，那末就是提供了一个极端，借此可以判断我们正在移动的方向。在另一个极端，并且同样未必被全体美国人民全心全意去追求的，乃是一种我们这个世纪许多人都向往的生活。那种生活的基础，是一种对许多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主张，即作为现代科学执行者的全权政府可能是空前的财富、正义和幸福的代理人。如果集中注意于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流血表现，那末我们对我们的危险就会认识错误，我们会认为，这种政治制度对我们时代的伟大趋势或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来说是完全新异的。事实上，本世纪的世俗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激进个人主义的精神（最清楚地表现在极权主义政治制度中），还有我们这个世纪的和平主义和蔑视人类生活的特殊结合，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赖以生活的那些规则。这三者构成了我们面临的对未来的选择，其作用正像德·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留给我们的遗产一样大。

20 世纪已经教导我们，政府对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人民的性格的形成有着令人可怕的力量。大规模的极权主义运动所留下的东西甚至比 1 亿军团更可怕和更有教育作用。这是指的这个运动在活得比它更长的人民的心理和习惯中所产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在传给新一代。所有民族使社会主义摆脱自己，要难于使自己摆脱社会主义。

不那么极端的政府形式，实际上是不管哪个政府的单项政

策的效果不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同样真实，也许更实际地说是更有教益。例如，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强调再分配的“土地法”所引起的诉讼。很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纪以前，各种经济政策都已经在收集它对财富和社会影响的记录，正像关于家庭和宗教的政策已做的那样。受教育的人们同样长期以来就了解各种各样的组织政治竞争的各种制度对性格的影响。围绕 1949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的争论，充满着历史性的关注：政府政策如何影响到人民去过公正生活的能力。各个方面都在研讨历史，以便得到能取代已使魏玛共和国崩溃的财政和政治规则的东西。但在考虑社会政策时，他们找到了不同的模式。康拉德·阿登纳设法提供那种丈夫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的家庭模式，而库特·舒马赫则找到了以社会养育孩子为基础的良好生活的模式。美国之父们并没有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恐怖中，甚至也没有经受过法国革命的恐怖。然而，在乔治·华盛顿（他所喜爱的名言可能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民族的性格”）的领导下他们彻底搜索历史，汲取关于他们考虑的安排能够长期起作用的教训。美国开国的一代人在《旧约全书》有关上帝大费唇舌地反对以色列采纳君主政体的内容中看到了一种“常识性”的历史论点：人类平等的原则，以及大政府天生是浪费的和败坏习俗的等实际主张。⁵

政治制度和性格

本书的第一部分开始于这样一个论点，这个论点不同于现代美国的精神，但却是古代思想中的一个主题，即政治制度（政府和与之有关的既成权力体制）在人民的生活中造成多大的差异。

人们习惯的差异使人的身体差异相形见绌。不必多作旅游

或多读书就必然能明白，有些民族以劳动为荣，而另一些则逃避劳动；在有些地方谦逊是生活的准则，但在另一些地方，出风头占了统治地位；在有些地方，你夜间出门可以不用害怕，而在另一些地方，光天化日都不能放心；在有些民族中，一次握手敲定了一宗交易，但在另一些民族中，签字都没有用处；有些民族要打仗，其他民族则不要打仗；家庭纽带对某些民族的束缚胜于对其他民族；有些民族受制于对上帝的恐惧更胜于对人的恐惧，而其他民族则相反；类似的比照还有好多好多。简言之，当所有的人都很可能已创造出平等的时候，他们过的正常生活明显地是不同的。此外，那些能够使我们过着目前生活的习惯，并不能使我们过其他的生活。然而，人们的习惯在渐渐地改变。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这种差异提供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单一原因的解释。

但古人认识到，政治规则的变化有利于一系列的习惯胜过其他系列的习惯，他们并且奠定了新习惯的基础。我们难以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是西方基督教知识的继承人，这使社会和个人不像从前那样依赖政府。但 20 世纪使主权政府成为逻辑结论。今天，只有不多的几个政府花的钱会少于它们人民的财富的三分之一。几乎所有的政府已经成了幸运和声誉的主要制造者和破坏者，甚至成为真理的仲裁者。它们创造了全新的职业并支持人民中的全部阶级。简言之，我们现在也许比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理解古人所说“政治制度”（“regime”）的那种东西：官职和荣誉的一种安排，这种安排促使思想、爱憎和风气产生特殊的复合，并促进一系列成年人的标准和孩子们的志向。

对我们周围情况的注意，导致从实际上去把握政治制度在生活上造成的差异和政治制度如何着手制造这种差异。优秀的

专业旅游人员、医生、职业运动员、公司或军队中的官员 都很快认识到那些统治着任何既定的工作场所的人所造成的在激励和非激励方面的差异“气候”。实际上,大多数政治制度(无论是合作的或民族的)都制造出这样的气氛:例如,它们希望需要或排斥某些款式的服装(穆斯林面纱、埃德加·胡佛强加给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白衬衫和领带),或者某些类型的建筑、音乐和艺术。这些外部的标志通常是政治制度压迫人民的优先权的良好指示物。政治往往把营造政治制度的氛围留给私人。有时候它们故意这样做,如像智利军队在 1973 年和 1989 年之间让该国的自由市场改革者们营造智利生活的氛围。

特殊的政治制度在压制其他政治制度时,产生出一定文明的某种固有的潜在物。文明限制着政治制度的影响,以致如在那些神赐平等和个人价值不是不言而喻的文明中,我们也许不能合适地使用民主这一术语来描述扩展中的政治势力的运动。我们不可能讨论政治制度的经济影响,仿佛劳动的动力和对腐败的憎恶乃是同等地广布于人类的。由于文明的确是不同的,因而侈谈资本主义扩展到全世界是毫无意义的。

在一定的文明所建立的范围以内,政治制度的各种大的类型——暴君政制、几种寡头政制、民主政制⁶——都对人民的繁荣、文明礼貌、家庭中的精神上富有意义的生活、摆脱外国的支配有着特别的影响。

暴君政制下的政治和经济的标志是任人唯亲。财富确是另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来自与暴君的关系。现代政党独裁和古代暴君政制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跟从者非常多,以致在今天,社会被迫去支持和服从,还有是现代独裁制度下家庭和精神生活有意的堕落。在军事方面,暴君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特殊部队拥有的特权远远超过那些(通常是非常大的)正规武装力量。这

种部队的忠诚既是该政治制度的箭矢，又是该政治制度的阿基里斯之踵。使统治者发财的各种寡头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在于统治者对他人财富的态度。有一个极端，我们可以叫做“黑手党寡头政制”。例如，共产主义之后的俄罗斯，在那里，统治者把其他人的繁荣看作是对他们自己的威胁，在那里，友谊是对家庭的限制。宗教要求迷信，武装力量是用来消灭对手的某种东西。接着是不设防的自由港，像新加坡，那里的统治者在法律和低税制的范围内努力奋发，鼓励大批人民一心只想挣钱。在另一个极端，乃是大的寡头政制国家，诸如 19 世纪的英国、古代的迦太基和中世纪的威尼斯，它们都雇用了军队，建立了帝国，并对财富采取文雅的态度。

除了民主政治制度及其人民在任何特定的时期结合起来产生性格外，民主政制别无性格，因此，它们可以展示出其他政治制度的任何特征。就说古代罗马和雅典这两个民主政制的历史吧。它们完全摆动在英勇和怯懦、贫困和繁荣、自由和暴政、虔敬和渎神、和谐和内战之间。尽管没有一个人曾经放弃过对决定性格的选择，但民主政治下的人民却不断地面对着那些选择。哎，历史教导人们，当民主政制发现自己踏上世界时，它们的敌人就被战胜了，它们很快地倾向于破坏习惯的残余，而这些习惯曾经使自己伟大起来。

少数人曾经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上：怀着某种信心希望繁荣地生活着，繁荣的程度只受我们的努力的限制；力争使政府成为我们的敌人而不是我们的主人；不受打扰地住在家里；并且吓倒我们的敌人，甚至好像我们卑下地同我们的上帝一起行走。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做哪些事情以促进我们自己的习惯，使我们得以提高我们希望的名目呢？哪些主要选择使我们可以创造出我们国家的性格呢？

借助于决定我们政府的大小，我们将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对诱惑屈服，这种屈服是没落中的 20 世纪所特有的，乃是以自愿的友谊来取代权力。经济法规对公民社会的影响甚至超过物品的生产。政府挤压公民社会在道德问题上的自治到一定程度，它就迫使人民去通过权力寻找道德上的满足。政府给家庭提供的服务，倾向于减少家庭的职能。实际上，公民社会的自治主要指的是地方政府的行动或言论的自由范围。但地方的自决权会减轻社会最有力量的势力并考验每个人对差异的容忍力。

我们通过我们争辩的事情和我们如何组织我们的竞赛来确定我们自己。通过事情的争辩，利益集团得到既不有益于繁荣也不有益于文明礼貌的东西。正像林肯所教导的和当代关于堕胎的讨论一再表明的，对于谁被划进、谁被划出人种的争辩，对内战而言，乃是一种诀窍。最后，我们有别的什么事情要做，如果我们不使各主要阶级习惯于在国防事业中牺牲安适和冒生命危险，那末我们将碰到第一次严重的军事上的挑战。

政治制度造成的差异

本书的第二部分描述政府影响本国人民关于繁荣、文明礼貌、家庭和精神生活，以及军事防卫的各种方法。

记住，被视为神圣的逻辑原则即探索对善的理解，必须从沉思畏惧开始，⁷部分地也起始于对苏联政治制度的考虑（它的解体和失败现在是要承认而不是理解）。通过实际的教导，即是政治关系而不是生产率才是理解生活中善事的关键，苏联政治制度训练它的人民去浪费劳动和投资。苏维埃经济是一种充满恩赐的国家机器的非常有效的模式。像社会的其余部分一样，经济由一条最高的规律来管理：政治上的强者可以随心所欲，而弱

者则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官许的肆意妄为的盛行，解释了苏联帝国特有的生活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相互仇视。这一政治制度也试图彻底破坏家庭，只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一次人口统计冲击的恐惧才停止了这种破坏。然而这一政治制度征集妇女劳动，它侵占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的责任，以及它利用为控制出生而堕胎以培养男人的、我们使之同犹太青年相联系的性格，这一切播下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信任，并建立一种不幸福的母权制。作为对比，这一政治制度曾经实施的更为坚决的反对宗教的战役，却完全没有破坏人民对上帝的渴望。最后，宗教和民族的信条取代了共产主义的信条。尽管是渴望和信条，苏联的生活特征是无视宗教和没有宗教活动。没有比苏联政治制度的失败更表示出它的军事的失败。它曾在军事上花费了它最好的物质和道德资源。它在道德上失败于被认为军事是它最可靠的力量，失败于被认为专为实施（和不实施）它的卑鄙伎俩的特种部队的忠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全世界，用于使国家繁荣的熟练做法几乎普遍地是把财政信息出卖给个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三世界模式风行一时，接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所谓的日本—亚洲模式。但货物与货币流入第三世界，已经创造了那里有势力的寄生阶级，而在日本，强大的货物生产已留给许多人以第三世界的设备。非常简单，繁荣在于生产出更多的牛油而不是枪炮，更多的新设备而不是多打官司，在于最大限度地从生产者中“砍掉”非生产者，并且首先依法平等地对待经济方面的各式各样的参与者。但是，政治制度往往在规模上把生产远远地放在它们给以报酬的活动之下，并且随意地实施再分配。

请注意，由各式各样国家培植的技巧、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多么地不同。这些国家由于经济上的模仿而经常受到扶植。在欧

洲，统制主义（政府管理人员和已建立的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福利，联合起来统治经济生活。欧洲的福利文化已经在例如民主德国和南意大利习惯于受保护的地区的社会上层和底层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在它发展的同时，工人们倾向于开始后来的专业，结束先前的专业，并且工作的小时越来越少。与管理体制相比，工作没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是统制主义，加上高额税收，受宠幸和中奖比工作更可能使人发财。

作为对照 在奥格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政府统治下，智利开始把政治权力同经济生活分开，并用个人负责的习惯来取代集体竞争的习惯。为了使人民放弃找靠山，皮诺切特把国家权力分散给了他们，而宣布政治和企业同时活动是非法的。为了培植个人负责的习惯，他用消费者主权取代传统的国家服务，而把国家社会保险体制转变为个人退休账目。简言之，皮诺切特的政治制度把经济手段用于政治目的。智利后来的经济、政治福利与作为其基础的态度的变化相比，意义是较小的。

没有什么东西像统治者受法律束缚或随心所欲的统治那样，如此大地影响到经济生活、公民生活，或就此而言的家庭和精神生活。法治（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都产生于习惯地相信，有人有权利拥有事物和自由，而其他人则没有。这在现代政府中是成问题的。现代政府只承认实在法，那里的成百万未当选的官员在编写和执行无数页的规则，并且那里的大规模的行政不可避免地导致专断的实施。假装投票选举国家官员，把公民看作是那种实际上只能服从和欺骗性地造成玩世不恭的人。实际上，法律和公民的权利义务是随同财产权利和地方特权而兴衰的。再分配的政治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之所以起破坏作用，首先是因为它使实在法（一种没有固有限制的事物）成为一种党派偏见的工具。有些类型的政党产生的是党派偏见而不是

别的什么。基于彼此独立地当选的官员的政党，倾向于较少地破坏法律和公民的权利义务，而那种被自己的机构控制的政党则培植人治。法治是必需的，但并不满足公民权利义条件的条件。

从欧洲北端到克里特岛的当代欧洲政治制度，也显示出其自身是唯一合理的议程即社会保障的非政治的行政长官。由于欧洲人大体上接受了这一议程，所以欧洲的政治是死气沉沉的。尽管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大体上都接受政府的善意，而意大利人则大致上不接受，尽管由北到南影响的传布是不一样的，但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承认，他们担当的角色就是国民——享有权利的政府服务的消费者。然而，欧洲的真正公民——权力之由来和特权之享受者，乃是社会上的公司，无论它们是大企业、联合会、政党，还是官僚的综合体和提供资金的利益集团。因此，欧洲的政治制度同任何其他非欧洲政治制度相比，只有数量上的不同。例如，墨西哥的政治制度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基于墨西哥人所谓的民族制度（贿赂）。像大多数现代政治制度一样，墨西哥宣称社会经济知识和公司乃是该国主要的私人利益，而统治是通过非正式的网进行的。墨西哥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不同于大多数现代政治制度，并不是因为它的支持者没有巨大的势力来操纵他们的生活，或者因为特许的经纪人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多得多，而是因为大多数墨西哥人对法律和公民的权利义务完全不存有幻想。

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天生是家庭的敌人，因为它们的知识风尚指示出，一切人际关系（除了那些主权政府与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都纯粹是协定的。婚姻——家庭的基础，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的产物。当法律保护婚约与一方忠实于婚约，反对另一方规避或滥用责任时，法律支持男女的自然结合。但当人们喜爱

另一方时，法律就倾向于抹煞婚姻和协定关系之间的根本差别。法律借助于向这一边或另一边倾斜，对男人、妇女和家庭发生作用。20 世纪的政府也把自己插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公开地保护孩子，但事实上削弱了两代人之间相互负责的习惯。为了解我们这一时代截然不同的处理办法，人们必须走出西方，例如去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看看。

瑞典已显示出西方政治制度把家庭原子化地化为个人的趋势这一概貌。个人主要的求助对象是国家。瑞典的政治制度已经使两性之间的关系达到类似于原苏联的家庭，但没有后者那样矛盾重重。它的税收制度使让妇女外出工作成为提高夫妻收入的最有效的办法。学校教育人们，婚姻仅仅是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鼓励两性不受禁令的约束乃是最受社会承认的自由表达。从日间照料中心到工作地点都得到贯彻的以及甚至表现在住宅设计中的政府政策，乃是在减少两代人接触的时候使男人女性化并使妇女男性化的设计。这种社会政策的后果之一是到 1980 年斯德哥尔摩居民的 63% 是过独身生活的。作为对照，日本政府确信，该国的成功和它的统一本身就得归因于它的家庭的凝聚力。所以，日本的税法支持靠一个人养家糊口的家庭，而当局更支持社会排斥同居的夫妇和未婚的父母。日本私生子的比率是瑞典的五十分之一。⁸ 但日本当局已经开始至少就现代欧洲两性关系的理想作出了许诺，并且日本舆论倾向于听从政府领导人。沙特阿拉伯政府始终处于穆斯林兄弟关系和各式各样知识分子的压力下而变得更为伊斯兰化。它实施伊斯兰婚姻法，即要求平等地对待众多妻子（这种事情甚至对非常富裕的人来说都是困难的，并且有些人说，天生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在通过思想意识的推动，把它的人民推向实际上的一夫一妻制。

最引起争论和最重大的问题是涉及到宗教。现代政府同宗教的关系乃是一种对抗。尽管现在没有并且永远没有比犹太教和基督教更好的有关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的预言者，但西方政府已经利用它们操纵教育的权力首先教授世俗主义，接着是教授各种各样反宗教的教条，并在最近时期教授与宗教道德相抵触的生活方式。犹太—基督教的基本学说是，人类生活在一系列单一地、客观地、平等地约束着所有人的法律之下。正像政府排除西方社会的宗教喜好那样，它们引入了基于相对主义即权力的新信仰。因此，在今天，虚无主义为了争夺欧洲的灵魂，正在向一种松散的、配合得不好的自我崇拜和大地崇拜的结合物作斗争。宗教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硬性选择有了明显的效果。彻底的迫害（除非它是整体的）强化着宗教，而拥抱则通常使它窒息。仔细探讨的效果是更令人感兴趣的。

罗马在其漫长历史的不同时期里曾态度不同地对待宗教。在共和国早期，城市严格地尊崇本城的众神和对众神所起的誓言，其严格的程度超过了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但既然注意的焦点在于该城在战争中获胜，所以罗马的宗教决不会发展为一种复杂的含哲学或伦理的成分。于是，它因成为一种仅仅是动机的工具而迅速失去了人们的尊重。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官方的宗教成了与宗教不相干的东西，而每种斗争中的非官方的迷信则促进了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北欧，业已建立的新教教堂首先默许政府的社会世俗化活动，甚至传布官方的反宗教思想。在天主教欧洲，基督教民主运动（对战斗的自由主义的主要反应）放弃了为基督教事业的辩护，拒绝清楚地阐明对现代主要问题的立场，使自己日复一日地沉溺在管理事务堆里，终于完蛋。于是，在整个欧洲大陆，政治把人民训练得忘掉灵魂。在以色列，官方宗教被也许是四分之一的人所尊奉。犹太教的

法律地位的最重要部分乃是来自奥斯曼帝国法律中所固有的自治。代表着大多数对宗教漠不关心的犹太人（以及人数很少的反宗教的犹太人），犹太国家管理着宗教信仰不同的学校，并迁就某些有关安息日和婚姻的感情。但由于信教人数的增加和过于自信，有些世俗的犹太人感到他们的非宗教的犹太人作风非常野蛮，以致他们的行为嘲弄了他们的信教兄弟。这种情况既无助于以色列的灵魂，也无助于以色列在下一次战争中获胜的机会。

战斗和赢得战争的能力是性格的最后试金石，没有什么东西像人民从中取得军事力量的方式那样使人民具有性格或决定其命运。在古代共和国里，服兵役与公民资格是同义的。最后的政治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人民为支持政治制度愿意去冒他们的生命危险。以色列免去本国的阿拉伯人服兵役，甚至像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都不征募黑人，因为政治制度不可能在也许是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依靠他们。公民兵和复员军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政治制度，并且不可能忍受像国民一般的待遇。然而，购买兵役以及强迫国民服兵役的政治制度，必须保证军事干部的忠诚和满足他们的权利要求。没有什么东西像自己的生命被看作儿戏那样的士兵情感更能破坏任何政治制度。对三种政治制度的初步观察，显示出了它们的军事既成权力机制是如何形成它们非常不同的性格的。

英国在 18 和 19 世纪显赫一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所依靠的海军和地面部队，几乎完全由来自社会底层的男子组成，他们的生命变得完全有用了。来自绅士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军官们在承担义务和发扬帝国的光荣方面受到了严格的训练，这就提供了军队与政治制度的纽带。总之，军队像英国寡头政制的其他部分那样地发挥作用，并满足寡头政制的精确目